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È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美] 罗森 (Stanley Rosen) ● 著

分析的限度

The Limits of Analysis

夏代云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È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分析的限度

The Limits of Analysis

[美] 罗森 (Stanley Rosen) ● 著

夏代云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的限度/(美)罗森著;夏代云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9

(经典与解释·古今丛编)

ISBN 978-7-5675-5537-2

I. ①分… II. ①罗… ②夏… III. ①分析哲学-研究 IV. ①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2695 号



The Limits of Analysis

By Stanley Rosen

Copyright © 1980 by Stanley Ros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ugustine's press, Inc. through American Philanthropic,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4-680 号

古今丛编

分析的限度

著 者 (美)罗森

译 者 夏代云

审读编辑 纪 盛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2.7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537-2/B.1033

定 价 60.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ÈS



HERMÈ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古今丛编”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遂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秩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遂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

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此书献给

Francoise, Nicholas, Paul, Valerie, and Rex

与哲学中通常的情形一样，这里的首要困难在于，看清楚这个问题很困难。如果你问一个未经哲学训练的人：“你怎么知道我有两只眼睛？”他或她会回答说：“傻问题！我能够看到你有两只眼睛啊。”不要期待在我们的研究结束时，我们将会得到某种根本不同于这种非哲学立场的东西。将会出现的情形是：在我们原以为一切都简单的地方，我们将看到一个复杂的结构。我们将意识到不确定性的阴影正笼罩在没有引起人们怀疑的地方；与我们原来的设想相比，我们将更频繁地发现对事物进行怀疑是正当的；即使最貌似合理的前提，也将表明它们自身能够产生不合理的结论。最终的结果将是用清楚的犹豫代替不清楚的确定性。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真理与意义的探究》(An Inquiry to Truth and Meaning)

中译本前言

——纯粹智性的德性问题

五年前,我的一位在中国的常春藤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老朋友退休,我请他吃饭。酒过三巡,他突然放下筷子,语气沉缓地说:“这辈子啊太遗憾,搞错了学问……”我也赶紧放下筷子,吃惊地看着他……老朋友见我一脸不解,继续说:“我这辈子做的都是西方近代唯理主义哲学,直到快退休我才明白,唯有分析哲学才是真正哲学,其他哲学都是浑说一气。”

我释怀地笑起来,伸手摸他的额头,看他是不是在发高烧。老朋友拿开我的手,一脸严肃地说:“不是开玩笑啊,是心里话。中国的哲学系应该学美国,以分析哲学为主。”

我重新拿起筷子自个儿吃菜,不知道说什么好……

分析哲学才是真正哲学?老朋友的话让我想起80年代初期自己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的情形。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得知国外最热门的哲学是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解释学。据说,前者在英美学界占主流,后者在欧陆学界占主流,两派打斗得厉害,相互瞧不起。为了搞清双方如何打斗,我把双方代表人物的书都找来看。为了摸清分析哲学的看家本领,我满怀热忱去听数理逻辑课,还把王浩教授的《从数学到哲学》找来看。作者是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高足,奎因(W.V.Quine)在哈佛的及门弟子。作为中

国人,王浩在数理逻辑研究方面成就卓越,让我深感佩服:在纯粹智性方面,中国人的确不比欧洲人差。

在分析哲学中断断续续泡了三年,感觉自己像洗了一场冷水浴,不仅脑子而且浑身都清爽许多。分析哲学致力于净化哲学语言,让我受益良多:不要去学德意志古典哲学说些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的哲学谵语。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难接受分析哲学的宣称:几乎任何传统的哲学问题不是假的就是错误地提出的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净化哲学语言、寻求明晰的证明就等于真正的热爱智慧?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其中的三个细节不仅让我深受触动,而且加深了我对分析哲学的认识。

《普罗塔戈拉》记叙了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的三场论辩,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每场论辩都牵涉到如今的分析哲学。第一场论辩涉及正义、虔敬、智慧、节制四种德性之间的关系,由于论辩几乎以争执结束,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没法适应普罗塔戈拉在论辩时的说话方式,干脆起身要离开。这时,在场的好几位都出面劝说苏格拉底别走。精于语义分析的老辈智术师普洛狄科也出面说话,呼吁论辩双方保持“善意”:热爱智慧的人是一个友谊共同体,应该相互谦让,不要争吵嘛……同仁之间出现分歧,应该尽力听取对方。普洛狄科说话时非常注意语义明晰,随时澄清自己所用的关键词的含义:比如“共同”与“平等”有何差异,“敬重”与“称赞”如何不同,“欣喜”与“愉快”区别何在,等等(参见 337a1-c4)。在今天看来,普洛狄科颇有分析哲学家的风范,脑子清晰,非常精明、机智。

普洛狄科的这番劝言不仅在语言形式上有专业风范,而且表达了他对智识人共同体的看法:智识人的生活基于追求智识,这种追求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欣喜”,而非身体感官的“愉快”。追求智识得凭借智性,并非人人天生都有智性。严格来讲,多数人缺乏的

就是天赋的智性,因此,多数人只会追求身体的愉快,而且说话没法达到智者所追求的那种明晰的语言形式。如果少数有智性的人之间因为追求智识而相互打斗,就玷污了智识人的生活品质。普罗狄科呼吁苏格拉底和普罗塔戈拉各自发扬优长,本着智识人之间的天然友谊展开争辩。他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发言表明,说话讲究语义明晰不仅是智识共同体的标志,也是其成员资格的证明。

精通自然学和数学的智术师希琵阿斯接过普罗狄科的话头,把智识人共同体的观点往前再推进了一步。他说,凭靠智性生活的人属于同一个“家族”,甚至同一个“城邦”。世上其实有两个城邦,一个基于“自然”,一个基于“礼法”。“自然”这个语词具有多义性,希琵阿斯的实际含义指的是理智天性。换言之,自然与礼法的区分是上智与下愚的区分。普罗狄科的说法虽然以少数智性天分高的非常人与缺乏智性天分的多数常人的区分为基础,他毕竟没有直接挑明这种区分,因为当时在场的有几十年轻人,未必个个都智性天分高。希琵阿斯不仅彻底挑明非常人与常人的区分,还凭靠非常人的理智天性这一“自然”提出了建立纯粹的理智城邦的诉求。他说,基于“自然”(即理智天性)的城邦与基于“礼法”的城邦不同,由于智性的非常人“懂得诸事的本质”,比常人有智慧,他们可以不受礼法强制,常人则应该受到“礼法”强制,以免他们不服从非常人的智性(参见 337c5–338b1)。

发言结束时,希琵阿斯俨然理智城邦的君主,命令苏格拉底和普罗塔戈拉俩人和解。似乎在智识人的城邦里,谁最精通数理,谁就应该当王,因为数理代表最高最纯粹的智性。普罗狄科的观点还仅仅是强调智性化的思维与常人的思维不同,希琵阿斯的观点则隐含着激进政治要素:应该由哲人族中最具纯粹智性即数理智性的一类来统治城邦,因为,唯有追求数理式的明晰才算真正的热爱智慧。当然,在发表这番难免得罪多数常人的高论之前,希琵阿斯首先糊弄在场的所有人说:在座的个个都智性天分高。读到这

里,我没法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在场的年轻人有几十个,智性天分高的肯定是极少数,大多数缺乏智性天分的人听了这番话会怎样想呢?由于智性天分不高,他们很可能不会想到:按照希庇阿斯的说法,他们统统应该追仿热爱数理智性,然后脱离“礼法”的城邦——这样会不会让他们把自己本来好端端的脑子搞出毛病来啊……

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的第二场论辩涉及对诗人西蒙尼德斯的一首诗的识读,具体来说,涉及这位诗人关于“做高贵者”的说法是否自相矛盾。困难来自诗人刻意的含混表达:他首先批评古贤匹塔科斯的说法“要成为一个好男子,真的难啊”,然后自己又说“是一个高贵者,难啊”。争辩的焦点首先在于,匹塔科斯说的“成为一个好男子”与西蒙尼德斯说的“是一个高贵者”这两个语句的语义是否相同,或者说动词“是”与“成为”是否语义相同。普罗塔戈拉坚持认为,诗人先批评匹塔科斯的说法,随后又说与匹塔科斯相同的说法,明显自相矛盾,苏格拉底则认为看似矛盾,其实不矛盾,两人又僵住了。这时,苏格拉底主动请普罗狄科出面裁决并“纠正”诗人的语言,理由是他擅长辨析近似语词的语义差异,比如懂得区分“愿望和欲求不是同一个东西”(参见 339b1-d9)。

普罗狄科投了苏格拉底赞成票,普罗塔戈拉不服,说苏格拉底拉普罗狄科出面纠错,结果是普罗狄科比他所纠正的诗人出错更大。普罗狄科是分析哲学家哦,怎么可能在语词用法上不及诗人呢。苏格拉底替普罗狄科辩护说,这样岂不是“事情反倒被我搞糟啦”。苏格拉底随即用了一个比喻,说自己有如一个“可笑的医生”,“治病却搞得病更重”(参见 340d5-e2)。显然,这话在逻辑上有毛病,因为,说“治病却搞得病更重”纯粹从语义上讲自相矛盾。然而,这个从形式逻辑上看自相矛盾的表达,含义却没有问题。不仅没问题,这话还隐藏着谐剧式的机锋:“治病却搞得病更重”虽然是冲着普罗塔戈拉说的,实际上是说给普罗狄科听的。

换言之,这话是对普罗狄科痴迷语义分析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也是对分析哲学的批评。分析哲学宣称要通过澄清语言问题来医治哲学的病,结果“搞得病更重”,从而是“可笑的医生”。苏格拉底巧妙地佯装与普罗狄科为伍,然后拐着大弯批评普罗狄科,让他的语义分析遭受“治病却搞得病更重”这样的病句嘲弄。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普罗塔戈拉对苏格拉底和普罗狄科说,他俩的確是“治病却搞得病更重”,因为,诗人沒可能犯“太没常识”的错。这话的搞笑之处在于:苏格拉底让普罗狄科用分析哲学功夫修理普罗塔戈拉,没想到普罗塔戈拉反过来却帮苏格拉底修理了普罗狄科,并一语揭示了分析哲学的本质:“太没常识”。

争辩的第二个焦点是:诗人说做高贵者“难”的这个“难”字,意思究竟是指做高贵者是件“不容易”的事,还是指做高贵者是件“坏”事。毕竟,常人往往會把辛苦的事情視為“坏事”。普罗塔戈拉持前一种观点,苏格拉底持后一种观点,他认为,在这位诗人看来,磨砺德性是件过于辛苦的事情。这时,苏格拉底再次邀请普罗狄科出面裁决,理由是他不仅年纪大更有经验,而且懂得诗人的“方言”。用20世纪分析哲学的说法,苏格拉底眼下希望诉诸日常语义分析。普洛狄科再次肯定了苏格拉底的理解,但同时又向苏格拉底表示,诗人这样说并非真的认为“做高贵者是坏事”,而是责备古贤匹塔科斯“不懂得正确区分语词”(参见341a1-c8)。追求思想和语言明晰的普洛狄科最终给出的竟然是个两可的说法,难道是在搞笑?如果是搞笑的话,这个搞笑针对的只会是他自己。

这个细节极富戏剧性,看起来简直就像是苏格拉底导演的一场戏,让普罗狄科和普罗塔戈拉这两个智性极高的智术师相互修理对方的纯粹智性。苏格拉底两次让精于语义分析的普罗狄科出面对付普罗塔戈拉,佯装信赖他的分析哲学功夫,其实是一箭双雕:既让他打击普罗塔戈拉凭靠智性的自负,也让他体会到,自己

的语义分析功夫其实对付不了诗人为表达曲折含义而刻意玩弄的语词或语句。

柏拉图的笔法之高明,还不止于此。柏拉图让我们看到,这场讨论从头到尾都纠缠于语言表达的语义,丝毫没有涉及更为重要的实质性问题:究竟何谓做高贵者,成为高贵者需要何种德性。如果分析哲学以清除传统哲学中的假问题为尚,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样的问题是假问题呢?如果分析哲学才是“真哲学”,那么,这种哲学就是缺乏传统德性的哲学。

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的第三场论辩挑明了这一点。最后这场论辩讨论的主题是:何谓“勇敢”德性。首先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这次盘诘普罗塔戈拉时,苏格拉底显得像是在刻意发挥分析哲学功夫:追究“勇敢”这个语词的含义是否就是“胆儿大”,或者“懦夫”这个语词的含义是否就是“勇者”的反义词等等(349e1-350c5;359a5-360e5)。苏格拉底似乎在向普罗狄科演示,自己也会玩他那套语义分析功夫,而且玩得更娴熟。然而,苏格拉底同时也在向普罗狄科演示,自己追究“勇敢”德性的含义时,绝不会仅仅追究语词的明晰用法,而是要与切实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在讨论到真正的“勇者”是否会有什么“畏惧”时,苏格拉底巧妙地利用希腊语介词 *epi* 的两种不同含义来说明:没谁“追求”危险的事情,但总得有人“面对”危险的事情。这绝非仅仅是在玩一个让分析哲学的语义学功夫犯难的语词游戏,而是在实质性地探讨“勇敢”的品质。苏格拉底希望表明,“勇敢”作为德性并不意味着无所畏惧,而是有正确的畏惧。^①换言之,通过当众与普罗塔戈拉一起辨析何谓“勇敢”,苏格拉底实际上展示了做一个高贵者需要具备怎样的德性,从而实质性地讨论了第二场论辩中被单纯的语义分析

^① 参见施特劳斯的疏解,见刘小枫编/译,《柏拉图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5,页154注释及页158注释。

排除在外的德性问题。

我相信,苏格拉底虽然仅仅是在与普罗塔戈拉论辩,好些说法其实更多是说给普罗狄科和希琵阿斯这两位智术师听的,因为他们俩分别仅仅把语义学或数理学视为真哲学,不像普罗塔戈拉那样多少对实践哲学也有兴趣。苏格拉底向三位智性极高的智术师表明,如果不把“勇敢”与其他德性联系起来看,就很难搞清楚何谓正确的“勇敢”。这无异于暗示:即便纯粹“智性”是一种德性,若不把“智性”与其他德性联系起来看,就很难搞清楚何谓正确的“智性”。毕竟,《普罗塔戈拉》探讨的基本问题并非什么是德性,而是探讨各种单个的德性必须如何相互勾连,才是正确的德性。热爱智慧的人若仅有纯粹的智性天赋或仅仅沉迷于热爱数理化的智性,未必就是真的热爱智慧。

一旦我把《普罗塔戈拉》中的这三个细节连起来想,不免深感震惊。不妨设想:如果单纯追求智性的心智与“勇敢”联手,将希琵阿斯的正义论付诸实施,必定会制造出一个极为荒唐且残酷的城邦。有智性天赋的少数非常人热衷凭借自己的智性优长建立纯粹的城邦,并凌驾于礼法的城邦之上——就好像分析哲学热衷建立一个数理般的清净世界并凌驾于传统哲学之上。然而,苏格拉底却让我们看到,这类智性优异的人在德性上有严重缺陷。分析哲学无疑有追求纯粹智性的热忱,是否也有追求德性的热忱就不好说了。毕竟,单纯追求智性绝非意味着是在追求德性。

罗森(Stanley H. Rosen, 1929–2014)是施特劳斯的及门弟子,既不是分析哲学阵营中人,也非现象学—解释学阵营中人。在其一生热爱智慧的学术生涯中,罗森用功最多的是柏拉图作品,著有柏拉图绎读四种:《会饮》、《智术师》、《治邦者》和《王制》绎读(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写过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专著(两种)以及关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专著(各一种)。虽然主要专注于研读柏拉图,罗森以苏格拉底为榜样,也致力于与时代的哲